

BOWEN

博文

社会·人文 〇〇一

郑纳新 主编

刘瑜 民意与伪民意

钱理群 呼唤学术自省意识

甘阳 邹谠教授

欧阳江河 重读鲍勃·迪伦的抗议民谣

刘再复 周扬纪事

韩钢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张鸣

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范曾

我的自述（大学时代）

周云蓬

老爸成小孩

易中天

劝君免谈陈寅恪

博文

博文

CONTENTS

郑纳新 卷首语

观
点

- | | | |
|---------|---------------|----|
| 刘瑜 | 民意与伪民意 | 11 |
| 毛颖颖 | 万亿国富如何化为国民幸福 | 12 |
| 蔡慎坤 | 中国消费者为何去海外抢购 | 13 |
| 钱理群 | 呼唤学术自省意识 | 14 |
| 单士兵 | 北大会商学生，我们会商北大 | 15 |
| 人民日报评论部 | 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 16 |

人
物

- | | | |
|------|-------------------|----|
| 甘阳 | 邹谠教授《中国革命再阐释》编者前言 | 17 |
| 周保松 | 苏格拉底式的一生——纪念诺齐克 | 18 |
| 欧阳江河 | 重读鲍勃·迪伦的抗议民谣 | 19 |
| 刘再复 | 周扬纪事 | 20 |
| 田本相 | 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 | 21 |
| 老愚 | “瞎子阿炳”的真相 | 22 |

往
事

- | | | |
|-----|-----------------------|----|
| 刘擎 | 回顾马丁·路德·金抄袭事件 | 23 |
| 韩钢 |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 24 |
| 王晓 | 揭秘河北省委大院：程维高曾安排特殊岗哨护院 | 25 |
| 王金昌 | 王洛宾逸事 | 26 |
| 王俊义 | 军阀刘镇华为什么善待鲁迅 | 27 |

记忆
经历

南方周末编辑部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1999年新年献词） 92

情感

周云蓬 老爸成小孩 117

杰伊 等你回来刺痛我最美的伤口 121

访问

胡舒立、钱颖一 冷静认识自己，客观看待世界 125

李怀宇 江平：我的中国梦就是法治天下 127

浩宇 周有光纵论辛亥革命 140

灵子 何兆武：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场“文革” 143

林夕、朱耀伟 让流行歌词绵里藏针 153

专论

易中天 劝君免谈陈寅恪 1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文·第1辑 / 郑纳新 主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1.7

ISBN 978 - 7 - 5407 - 5016 - 9

I. ①博… II. ①郑…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2731 号

出 品 人 : 郑纳新

责 任 编 辑 : 岳文妍

装 帧 设 计 : 李 佳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销 售 热 线 : 021-51698622-88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11 字数: 140千字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卷首语

◎ 郑纳新

自从网络开通以来，人类的生态为之一变，群情毕汇，天涯咫尺，有人论之为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确乎不为过。以阅读写作而言，才子与权贵的特权宛然已成庶民的日常，草根写作即便泛滥成灾，但也是天下大乱群英竞起，无庸多虑，精神的世袭与思想的懒汉全都靠边了，那些习惯为读者提前把关的筛选专家也几乎无法作为，只能望洋兴叹。此种状态自然可以说是技术对社会管理的革命，是人类往前迈出的一大步。但欢喜之余，回过头来，还是不能不有点疑惑。面对日渐稀少的闲暇，面对那浩渺无边的文字海洋，我们如何不被淹没？

该读些什么？哪些文字不能错过？

于是，我们依然相信选择之必要，相信披沙拣金仍然是一种总体最经济的工作，相信高效的阅读首先来自于读品的精粹，相信阅读带给我们知识、智慧、感动和心灵的慰安。一言以蔽之：选择塑造阅读，阅读塑造人生。

当然个人的趣味不能作为精粹的标准，少数人的怪癖与坚持也不能代言多数的需求，但成千上万甚至上千万人的选择，至少表明了一种多数的关注和认同。把筛选的权力交给读者，以他们的选择来确定用稿的标准，这是否是一个新的编辑原则？我认为这至少是可以尝试的，在点击率可以准确计算的时代，这也是可行的。

我们同时相信，纯粹的知识、智慧的文字与真实的情怀往往是没有过去时的。当我们日复一日地奔波在乡风市声之中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很多生活的旅迹被

悄悄地记录，如花绽放？当我们年复一年地诵读那些经典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的身边也正在诞生着一点点的经典性作品？带着生命的光芒，感动着激昂或沉默的人们，它们的出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精彩的地方。我们需要感知，需要记忆，需要在语言的空间里重新经历。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编辑出版这样的系列读物《博文》。何谓博文？虽然先哲有言，博学以文方是成圣之道，但我们难有如此巨大的期望，唯想博采天下好文章，为你我的阅读省点时间，省点精力，多点收获，多点趣味，于人生多点关切实用，于社会多点血脉相连。如能由此而激发出读好书与好读书的风气，生活或能渐趋佳境，邦国日进其新亦可期矣。

二〇一一年五月六日

民意与伪民意

◎ 刘瑜

在我听到的各种为大跃进辩护的言论中，有一类是这样的：当时人民的积极性很高啊，大炼钢铁一拥而上，人民公社热火朝天，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是民意！

对，还有人在给大跃进辩护，话说这是21世纪。

同理当然也可以运用于反右，“文革”等。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隧道，跑到1957年10月的中国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要不要引蛇出洞揭批反动右派，测验结果多半会是“要”。或者穿越到1967年1月去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应该不应该修理“走资派”，给他们戴高帽游街批斗，估计民意也会万众一心地说：应该！岂止“应该”，他们还会在调查表里找有没有“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选项。

不奇怪。1936年到苏联去，大清洗也是民意。1939到德国去，打波兰也是民意。

现在，假设我们是一场选美大赛中

的裁判。主持人指着台上光芒四射的美女宣布：“你们有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A，或者A，或者A。”

哇，琳琅满目耶。

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

有一种民意叫伪民意。在一个多元意见、选择自由不可能的环境里，民意只能被认作是伪民意。即使它是真民意，你也无从知道它是不是真民意。

伪民意未必是假民意。它未必是数据舞弊，比如把35%的支持率用橡皮擦擦掉，改成95%。它也未必全然是政治恐吓的产物，虽然恐吓往往是其要素之一。在特定时刻，人们可能是真心地想要大炼钢铁、搞人民公社、支持大清洗、支持军国主义。1958年，当公社社员坐在堆出来的麦地上拍丰收卫星的照片时，观察他们脸上的笑容，笑得那可是货真价实。1966年，当红卫兵们将皮鞭抽向地富反坏右时，他们眼里的熊熊

怒火，肯定也不是伪劣产品。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如果美女A盛装在镁光灯下从观众面前惊艳地飘过，而美女B只能带着口罩站在舞台后方黑漆漆的角落里。就是百分之百的观众百分之百真诚地选择了美女A为选美冠军，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镁光灯质量不错，以及那个口罩还挺严实。

最近我读到一篇关于“中国民主观”的文章，就给我这种印象。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调查显示，中国人的民主观是“家长式”的，而不是“自由式”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领导为老百姓着想，那就是民主了，民众自己犯不着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当中去。民众自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那是“自由式”民主，咱们不吃那一套。

既然是民意调查的结果，那数据肯定错不了。问题在于，如果被调查者天天生活在家长式民主里，每天听到的都是家长如何可亲可信可敬，却从未见过其他式民主长什么样，信息不对称不充分，这样的调查能说明什么呢？你说，让你选你爱吃猪肉还是爱吃恐龙肉，你怎么选呢？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睡梦教育”，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地向他们广

播重复信息。比如，“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苹果是个坏东西。

当然制造伪民意不仅仅依靠宣传，还可以依靠贿赂：凡是选择A的，可以得到夏威夷浪漫之旅机票两张哦。还有煽情也很重要：从前，有一个美女叫A，她来自于一个贫苦家庭，而另一个丑女叫B，她的爸爸叫李刚……

1953年9月的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发言批评政府的农村政策，说工业化大刀阔斧，农村却被忽视，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说梁是野心家、伪君子以及“用笔杀人的杀人犯”。不知好歹的梁漱溟较起真了，非要把事情讲清楚，说要看看毛主席有没有把话听完的雅量。毛主席还没彻底表态呢，台下群众不答应了：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停止他的胡言乱语！……梁漱溟赖着不走，不肯下台去，固执地跟毛主席要“雅量”。最后，会议只好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他是否有说下去的权利。

表决结果是什么呢？

万亿国富如何化为国民幸福

◎毛颖颖

岁末年初，盘点性数据一一出炉并引发热议。

先来看“国”。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77390亿元，增速2倍于GDP。有媒体随之算出：如再加上非税收入——国土资源部官员不久前曾披露，2010年国内土地出让金总额达2.7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去年一年，我国政府总收入超过10万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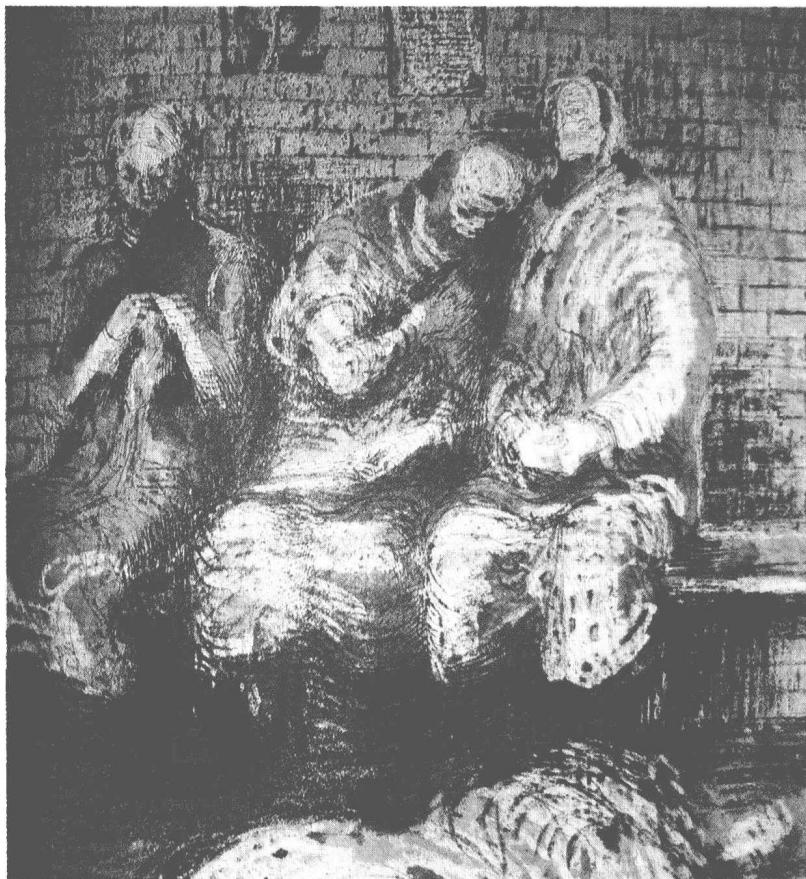
再来看“民”。本周，央视财经频道发布“2010经济生活大调查”报告，称在8万余份有效问卷中，44.7%的人感到生活幸福及很幸福，11.1%的人感到不幸福和很不幸福。而让大家感觉“不幸福”的因素颇有普遍性，即收入、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

财政收入增长、国力日益增强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当“国富”再一次得到有力印证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44.7%的“国民幸福率”。这个数字虽然依旧未必十分契合人们的感受，但较

之此前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在当地民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面操作出的所谓幸福指数，多少还是客观了一些，至少调查报告里有一句话说到了点儿上、说到了多数人心里，那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幸不幸福，怎么才幸福，只有公民自己说了才算”。

今时今日，“幸福感”已经成为民意的出口，而GDP、财政收入、外汇储备等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富”数据最终也几乎会导向同样的话题：做大的蛋糕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缓解普通国人对生活保障与自身权利的焦虑？在社会资源与资金出现向政府集中趋势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让利于民？在“不差钱”的情况下，政府又当如何更正义、更透明地“收钱”、“花钱”，巨大的社会财富能否避免成为楼堂馆所、落后项目乃至少数人的津贴福利？

正如对幸福越来越敏感一样，今天，面对巨大的“国富”，普通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社会舆论



无题

作者亨利·摩尔（1898—1986），英国现代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
他的作品体现了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深刻关怀

对普惠性减税、化税为薪的呼声高涨，在车船税法草案征求意见中，54.62%的网民要求修改草案、降低税负就是最好的证明。但值得忧虑的是，“让利”、“减税”说之频频，动之却殊为不易。比如日前就传出消息，酝酿十年之久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最终结果还是“小步慎行”，在物价上涨显著加剧的情况下，起征点之争依然被淡化处理，代之以减少纳税层级的方式“软性减税”。如果这个消息得到证实，那么无疑给普惠性减税的希望泼了一盆冷水。

而比相关改革进展缓慢更值得忧虑的是，某些不公平的社会规则进一步阻隔了“国富”化为国民幸福的路径，相对的剥夺感和弱势感既成了激化收入、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的催化剂，也成了加剧不幸福感受、扭曲社会心理的原因。可以说，因为“上大学被顶替”、“公务员住保障房”、“机关事业单位量身招聘”等事件引发的许多人精神上的贫穷感、无助感与不安全感，以及许多人对“关系”与“门路”的追逐与迷信，比少数人暂时的不幸福、不富裕更危险，更值得警惕。

国家发展的目的是增进国民的福祉，而“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期待”、“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

有尊严”已成为社会共识。“国富”化为国民幸福如何能落在更多、更大、更积极的行动上，政府又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建立更公平公正的规则，这比单纯的承诺和纸面上的目标重要得多。

中国消费者为何去海外抢购

◎蔡慎坤

中国消费者为何去海外抢购？

近年来，中国消费者到海外抢购的消息屡见不鲜，许多西方国家的奢侈品店名牌店里挤来挤去的全是华人，即使在与深圳毗邻的香港，内地游客最热衷的事情，还是抢购黄金饰品、名包名表、化妆品、婴幼儿奶粉……在刚刚过去的兔年春节期间，从伦敦到柏林再到拉斯维加斯，从东京到首尔再到迪拜……中国消费者成了各地期盼的“财神爷”。在全球经济还艰难的时候，中国“狂购族”在海外显示出来的强大消费能力，让各国媒体频发感叹：中国到底是穷国还是富国？

中国消费者热衷于海外购物，除了货真之外，最吸引人的还是价廉。同一品牌甚至同一产品价格国内外相差太大，有的价差甚至悬殊达一半以上。即使是同一款Coach的拎包，在北京西单要2000元人民币，但在美国的Outlet（类似品牌连锁店），不到100美元，按照汇率计算，国外价格不到国内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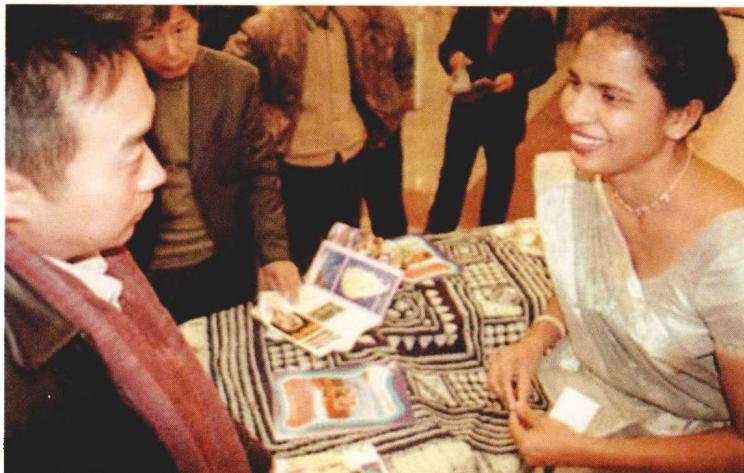
半；同一款HugoBoss的西服，在国内的精品店，标价动辄上万元人民币；而在美国的百货商场，一般也就在300到400美元。

而国内制造的笔记本电脑出口到欧美、新加坡东南亚等地，然后再偷运回来在大陆销售，成为所谓“水货”，加上各种费用，价格依然比国内商场卖的行货价格低很多。

据商务部统计，手表、箱包、服装、酒、电子产品这五类产品的20种品牌高档消费品，国内市场比美国高51%，比法国高72%。

商务部发言人姚坚近日也坦承，这对于中国消费者“不太合理和公道”。中国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老百姓的收入远远不及发达国家，而许多中国制造的商品在中国的售价却普遍比外国高。

中国制造本来有劳动力的优势及资源优势，但同样产品的价格却比国外贵，这对本国老百姓当然不公平。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是



在来自中国大陆的购物者面前，这些洋人笑容可掬

真正的对外开放，对外的贸易壁垒高。贸易壁垒包括关税、进口限制、换汇限制、不完善的外汇政策等，结果导致海外产品不能像在开放国家的市场一样在中国国内正常销售，因而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中国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加征消费税，很多奢侈品或者是不利于环保的商品，是消费税重点照顾的对象。需要缴纳消费税的商品包括烟、酒、鞭炮、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尔夫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摩托车、小汽车等。共有13个档次的税率，最低3%，最高56%。

数字显示，无论从个人来讲还是从企业来讲，2009年，在全国6.3万亿元的税收总额中，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在内的直接税收占的比重只有28%，间接税的比重高达七成；2010年

税收总额73202亿元中，间接税的比重仍然占到了七成左右。从个人生活来看，构成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者真正生活负担的，并不是作为直接税的个人所得税，而是增值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即每个家庭天天去超市买油、买盐、买米，或到餐馆吃顿饭，实际上都要缴很重的间接税。

尽管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购买国。然而《纽约时报》在一篇名为《购物，中国，购物》的文章里这样写道：中国依然一个贫穷的国家，他们的人均GDP比泰国和秘鲁都要低。在远离大城市的农村里，许多人依然因为贫困维持着最低水平的物质生活及放弃最基本的教育。◆

呼唤学术自省意识

——在《赵俪生、高照夫妇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钱理群

我要说的是，赵俪生先生的书里实际上讲到了我，我是他的评述对象。因此，我读赵先生的回忆，就会有对自我的一个反省。赵先生说，我对王瑶的研究生都很注意，他们的文章大部分都看过。然后他特别点到了我们对周作人、郑振铎、夏衍的研究。——这里赵先生的记忆可能有误，因为我们同学中没有人专门研究郑振铎，夏衍也只是我写过一点。但是研究周作人，肯定是指我了。他有这样一个评价：“很广，又很杂，但在功底上显然不够过硬，比他的老师稍逊一筹，有的一筹还打不住。这些都是新时代带来的异化了”。——这也是典型的赵氏语言，而且引起了我很大的思想震动。赵俪生先生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我自己，也许还有我们这一代学人不能回避的问题：“新时代带来的异化”所造成的我们先天性的不足。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可以说多年来始终缠绕于心，难以摆脱。赵先生的当头棒喝，又让我猛悟到问题的

严重性。我们再也不能回避了。

我是1960年大学毕业的，我们这一代学者，就是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是在批判封、资、修的文化、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强调要和传统彻底决裂，要制造精神、文化的“空白”，越“穷”（物质与精神的穷困）越好，“一穷二白，正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且这样的“决裂”，越来越彻底，范围越来越广，到文化大革命就达到了顶点：不仅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主义”的，所有的西方文化都是“资本主义”的，而且苏联的、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也是“修正主义”的，连中国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也都是“修正主义”的，通通需要“彻底决裂”。这样的彻底、全面的决裂的结果，就造成了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知识结构上的重大缺陷。王先生当年就跟我说，你有三大弱点：第一，你

不懂外文；第二，你的古文修养不够；第三，你的文字不漂亮，不讲究。这说的是实话：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至少我自己是非常隔膜的。当然，具体到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人，情况可能不一样，也确实有对古代文化或西方文化有精深研究的学者，但就整体而言，确实如赵俪生先生所说，比起我们的老师“稍逊一筹，有的一筹还打不住”。而赵先生所说的“新时代带来的异化”，我理解指的就是毛泽东时代推行的“批判封、资、修”的“彻底决裂”的思想文化教育路线、政策所造成知识文化上的断裂，作为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残缺不全，当然是一种“异化”，而且是根本上的“异化”。——这里，顺便讲一点，这些年文化保守主义盛行，总要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把鲁迅、胡适那一代人视为“文化断裂”的罪魁祸首，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前面讲过，赵俪生、王瑶都是五四培养出来的，他们身上就不存在文化断裂，真正的断裂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文化体制的产物。文化断裂，绝不是五四传统。把一切归罪于五四，就会遮蔽当代文化体制的根本问题。

我在《我的精神自传》一书里，对我自己，我和老师辈的关系，曾有过这样的反省：“一方面因为我对五四新文化，特别是对鲁迅的迷恋和熟悉，使我能够与王先生有精神的相通。但，作为

他的学生，我却无法继承他的学贯古今的学术传统。他所达到的高度是我不能企及的。也就是说，学贯古今中西，这本来是从鲁迅到朱自清到王瑶的现代学术的重要传统，但却是我这样的学者，所望而止步的：非不愿也，乃不能也。更重要的是，我的知识结构的缺陷，也使得我在根本上与我的研究对象，如鲁迅、周作人，也是隔膜的，因为他们于中国传统，西方现代文化传统，都有很高的造诣和很深切的理解。也就是说，我对他们的研究，达到一定层次以后，就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很难再深入下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研究《野草》，发现鲁迅在内在精神和语言上跟佛教相通，但是我不懂佛学，我只能有这么一个感觉，却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上深入研究下去。而且鲁迅和佛教的关系是十分内在的，因此，只有对佛学与鲁学同时精通的学者，才能完成这样的课题，不是临时去读几本佛经，就能做的，现在也有些年轻学者做的研究，总有些隔膜，原因就在这里。我因此经常说，“自己即使在学术上也只是历史的中间物，就是看清了这样的根本性缺陷。而且这是时代与命运造成的（是赵先生所说的‘时代带来的异化’），非我个人所能把握。因此，在我内心深处，常有悲凉与无奈之感。人只能在历史允许的范围，做自己能做的有限的工作”。“问题还在于，这不仅仅是知识结构的缺陷，而且更是精神层面的。特